



苗春风◎著

当代中国社会 树典型活动研究

A Study on the Activity of Setting Model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光明日报出版社



苗春风◎著

当代中国社会 树典型活动研究

A Study on the Activity of Setting Model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 / 苗春风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2-5775-8

I. ①当… II. ①苗…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4999 号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

著 者: 苗春风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775-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新汉

我从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指导工作已有十多年了,经我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有四十多位,其中包括一位来自韩国的博士生和一位来自越南的硕士生。每每这些学生从全国的不同地方或国外向我发来汇报自己成长或问候的信息,我会感到难以言喻的愉悦,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他们相处尤其是给他们指导论文时的情景。苗春风博士的论文指导过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在于她的努力和踏实,而且也在于她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生下了女儿,是女儿心目中可亲的美丽妈妈。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主要从事认识论研究,后来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研究价值论问题,即主要从事评价论研究。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①。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就是价值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构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于是人类就不仅生活在物理形态的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价值形态的世界中。人类通过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来理解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渗透在一起。

我在评价论的研究中,先后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真善美》(1993年)、《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1995年)、《社会评价论——社会群体为主体的评价活动思考》(1997年)、《民众评价论》(2004年)、《权威评价论》(2006年)和《自我评价论》(2011年)。其实,在所发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邓小平认识论思想论纲》(2001年)和《审美认识机制论》(2002年)中,我把作为邓小平认识论思想核心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理解为物理事实和价值事实的统一,把“求是”的过程理解为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的统一;把审美活动理解为作为追求“真”的认知活动和追求“善”的评价活动相统一的过程,从而就与我的关于评价论思想结合了起来,是我的评价论思想的延续和展开。在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论文的过程中,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对我的评价论思想予以丰富和发展,以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欣喜地看到我的学生中有很多成果超过了老师。

关于评价活动,从主体的角度来划分,可分为个体评价活动和社会评价活动。与国内有些学者把社会评价活动理解为以社会为客体的认识活动不同,我把社会评价活动理解为以社会为主体的认识活动,而权威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则是社会评价活动得以进行的“有机”形式和“无机”形式。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在相互作用中的运作。社会的表彰是这种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纵观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一部表彰史。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有旌表活动,在现代社会里有树典型活动。

于是,我的一个博士生以《传统旌表活动与基层社会的控制》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并以《中国古代旌表研究》为书名公开发表。旌表意在“标榜德行,彰显皇恩”,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民间的表达,是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民间的渗透。“自秦、汉以降,历代的王朝对所谓的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往往由地方官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予匾额,或由官府拨银造牌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封建统治者的旌表是与当时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匹配的,这种匹配的背后则是与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生活于社会基层的广大民众的利益。在旌表活动中,“民众有时会集体上书为某一个人和某一家‘讨名声’,有时也会集体指责某人违反主流的伦理道德,于是就有了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自下而上的响应。”^①旌表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正体现着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统一。《中国古

① 本段中所引用的都是李丰春所著《中国古代旌表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代旌表研究》就探索一条国家权力下参与民众主动认同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路径研究而言,应该说是成功的。“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古代的旌表制度和现象作出缕分丝析的梳理,可以说在学术上填补了一个空白。”^①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是苗春风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典型中国——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篇名上就可知道是对当代社会的表彰予以研究。作者把树典型活动理解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把“权威评价意志(意见)以典型符号的形式传播到社会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权威机构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整合而非分化的力量;“权威机构的权力运作需要借助典型符号,典型符号可以转化成典型自身所需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民众则策略地(视具体情况或积极或消极)学习典型”;“在中国意识形态逻辑的指导下,树典型活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将会一直延续下去。”^②由此的一个逻辑结论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予以研究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社会需要这样的研究。

树典型活动作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其渊源就是绵延中国传统社会的旌表文化,是儒家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也有一个绵延的过程,是国家治理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部表彰史,那么当代史从某种意义上就可谓是一部树典型活动的历史。作者在较为深入地分析了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树典型活动后,指出:“树典型活动都是由权威机构主导,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前,权威机构主要树立革命英烈、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英模式典型,改革开放以后,权威机构继续树立宣传英模式典型,同时大力树立科学精英、发明大王、技术能手等各行各业的杰出典型”,“权威机构在不断培养与扶植老典型即典型的‘常青树’(如雷锋、焦裕禄等)的同时,会不断推出新典型”。

通过对我国几个时期树典型活动的研究后,作者提出了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权威机构所树典型的“效果却无法与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更无法与雷锋、焦裕禄典型被树立的 20 世纪

① 见陈新汉为《中国古代旌表研究》所写的序。

② 以下凡引号中的文字除特别注明外,都引自本书。

60年代相比”。作者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后认为,“树典型活动的理论(权威机构的意识形态)逻辑与实践(典型、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利益追求等)逻辑相悖而导致民众对典型的复杂看法(崇敬、感动、理智、怀疑、冷漠、不屑和嘲讽等)”。这个“逻辑相悖”对于当今社会的树典型活动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在当今的社会转型和互联网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民众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思维能力不断增强”,需要不需要树典型?如果需要树典型,那么应该如何树典型?

本书作者有一个很好的命题:“典型是历史和需要的产物”。这里的“需要”当然不是个人需要,而是社会需要或时代需要。因此典型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树典型活动是一种权力运作机制,然而典型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能否取得“典型治国”的效果,即树典型活动能否获得成功,决不能仅仅归功于权力的运作。本书作者认为:“在树典型过程中,权威机构、典型本身和民众三方相互影响,互动的背后受利益支配。”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利益就是广大民众的利益。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这个“目的”就与“利益”联系在一起。人民创造历史就是指人民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创造历史。树典型活动尽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机制”,但必须与自下而上的体现着广大民众利益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结合起来。本书作者很深刻地指出,“树典型活动必须回归其本真”。这个“回归其本真”就意味着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相结合,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结合;由此典型就能够扎根于社会的土壤之中,从而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树典型活动如何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相结合?这就要研究作为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微观机制中的认同机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认同就是关于“我是谁”的意识,因此“‘认同’就是‘自我认同’”^②。个体在实现“我是谁”的意识中,一方面“让社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分享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让个体成为某社团的一员”^③,由此就必然涉及到关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认同“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② 陈新汉:《自我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③ 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项‘自我的延伸’，这是认同核心。”^①典型作为一种权力符号，体现着权威机构所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个体对典型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为要实现个体对于典型的认同，权威机构在树典型活动中必须遵循个体认同社会价值观念的两个原则即自愿原则和利益原则。

这就为作者研究树典型活动指出了一种新的方向。然而就本书的任务而言，“首次从社会评价论角度，并结合符号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并且阐述和分析得相当细腻和深刻，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2013 年 11 月于上海

^① David. L. Sill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um 15, Copyright (C) 1968 by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INC. p. 250.

前 言

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德治传统,树典型这一极具政治和道德色彩的活动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权威机构政治-道德运作的需要。树典型活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树典型活动的效果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甚至在某些方面持续弱化,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书主要从社会评价论和符号权力理论的视角研究树典型活动,重点探讨树典型活动的作用和运作机制,分析树典型活动社会效果的变化及其原因,揭示树典型活动作为符号权力运作的实质。

将树典型活动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一项社会事实进行考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下面五个问题尤为重要:一是树典型活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揭示“典型治国”的文化根源;二是树典型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历史联系,探寻其演变规律,从而“历史”地看待这种“活动”;三是树典型活动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在树典型活动中的作用与影响;四是树典型活动的运作机制,重点是树典型活动与权威机构的运作;五是树典型活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分析社会转型期树典型活动社会效果的变化及其原因。本书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个案分析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本书把现实与传统相结合,梳理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追根溯源,探讨树典型活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揭示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与“典型治国”的文化根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

传统和义务价值观传统,同时,与传统旌表制度紧密相连。“典型中国”现象实质是中国道德化政治的直观体现,是中国德治文化传统的现实表达,也是权威机构以德治国的需要。

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本书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树典型活动进行了梳理,包括革命战争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时期,探讨了树典型活动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联系。本书从权力视角研究树典型活动,重点探讨了树典型活动在政治与社会动员、政治社会化、规训与奖惩、话语与社会记忆方面的作用,揭示了树典型活动与权力的关系,深入反思了权力在其中的地位及引起的效应。树典型活动成为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书首次从社会评价论角度,并结合符号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树典型活动是一种权威评价活动,一种基本的宣传灌输价值观的社会管理手段,是权威机构进行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树典型活动的成功运作也离不开民众评价活动,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树典型活动的积极作用。树典型活动实质是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发挥着符号权力的作用,它把权威评价意志以典型符号的形式传播到社会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权威机构的意志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树典型过程中,权威机构、典型本身和民众三方相互影响,互动的背后受利益支配。权威机构的权力运作需要借助典型符号,典型符号可以转化成典型自身所需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民众则策略地(视具体情况或积极或消极)学习典型。在中国意识形态逻辑的指导下,树典型活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随着社会转型,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界通常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严重弱化,本书并不简单地认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虽然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挑战,但不同类型的典型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树典型活动面临着新的机遇。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而树典型活动在方式方法上的不足也值得权威机构反思。在公民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权威机构应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转向,树立适应未来公民社会需要的新型典型,不断改进树典型的技术,使树典型活动更有成效。

在当今多元文化社会,是否需要树典型,树什么样的典型,怎样树典型等问题亟须我们从学理角度进行解答。典型的功能问题尤其是价值功能问题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树典型活动应回归其本真,作为一种基本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管理手段,发挥价值引领功能,传播正能量。在一个文化多元、媒体多样的时代里,如何打破单向性灌输模式,多维、互动地发挥典型引领的价值功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文化强国的使命感,基于核心价值如何具有巨大而持续的情感能量、如何实现符号内化等基本问题,通过总结、反思中国典型引领中的价值功能,寻求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机制以及社会认同机制,是今后树典型活动研究的重要议题。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5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16
第四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	26
第一节 树典型活动与“大一统”传统	26
第二节 树典型活动与道德教化传统	29
第三节 树典型活动与义务价值观传统	33
第四节 树典型活动与旌表制度	36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中的树典型活动	39
第一节 革命战争时期的树典型活动	39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的树典型活动	44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树典型活动	51
第四节 树典型活动与社会文化变迁	57

第四章 权力视角下的树典型活动	70
第一节 树典型活动与政治和社会动员	70
第二节 树典型活动与政治社会化	78
第三节 树典型活动与规训、奖惩	86
第四节 树典型活动与话语、社会记忆	91
第五章 树典型活动的运作机制	97
第一节 权威评价活动与典型身份的确定	97
第二节 权威评价活动与典型事迹的宣传	102
第三节 树典型的过程是一种权威评价活动	114
第四节 民众评价活动与树典型活动	120
第六章 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	134
第一节 树典型活动社会效果的变化	134
第二节 树典型活动社会效果变化的原因	139
第七章 多元文化时代的树典型活动	155
第一节 树典型活动与符号权力运作	155
第二节 树典型活动与文化价值引领	166
结 语	178
参考文献	181
附录一 访谈提纲	197
附录二 中国社会树立的部分典型	198
附录三 本书作者关于树典型活动研究的成果	205
后 记	20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与“单位”一样,“典型”也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单位”自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社会学的视野以来,研究成果颇多。而时常见诸报端的“典型”却没能引起学界(社会学界)的关注。^①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标语治国”^②,其实中国又何尝不是“典型治国”^③?

① 参见冯仕政:《论中国社会中的“典型”》,社会学视野网,<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shehuixuelilun/2007-05-11/1822.html> 这引起笔者对“典型”问题的关注,随着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近几年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劳模、英模、样板村等典型(关注具体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村庄)。只是在把“树典型”和“典型”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社会现象、社会事实)与核心概念方面,社会学界没有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树典型现象是如此普遍和通用,以至于我们都习以为常。

② 有效的宣传,必须力求通俗,简约为少数几点,且化为标语,使群众了解标语口号里的意思(理由:群众的感受能力有限、理解力差、健忘;标语如果太复杂,效果不佳)。参见叶至诚:《社会学概论》,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6页。对中国标语口号的详细探讨可参见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③ 一些学者根据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而把中国称为“道德中国”、“德治中国”、“单位中国”等,笔者称之为“典型中国”,意味中国为“树典型”的“典型”国家。

中国社会曾先后树立过各种各样的典型。典型,《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训诂学家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为典型。”典型原指模型与模范,中国古代谓之“典范”,“典”者即“典制”(典章制度)、“经典”、“常道”、“准则”,典范又称示范、榜样、楷模和样子。典型现指在同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物。本研究中的典型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包括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集体、典型村庄等。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树典型的工作方法。本研究拟集中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来的树典型活动^①。树典型(在中国日常话语中也称作抓典型、树榜样或树样板)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一种工作方法,体现了中国道德化政治的色彩。总的来说,中国绝大部分典型都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活的、形象的解释者,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

本书之所以把树典型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

第一,树典型活动是曾经、甚至现在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或事实^②。

①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展开了树典型活动,树立了各种典型。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树立过各种典型,涉及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典型从时间维度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革命战争年代树立的典型,主要包括前方的战斗英雄和后方军民生产

①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树典型”在中国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自觉的、得到广泛遵从和应用的政治治理方式,其出现却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我们现在通常所见和所说的“树典型”,是毛泽东同志创造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奉行的一种工作方法,大量“典型”的诞生就是这种工作方法的直接后果。参见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

② 涂尔干发表了在西方社会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他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涂尔干对社会现象的定义: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于团体中,不仅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到的现象。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社会现象是可以用感官与知觉去体会得到的,因为它是外在于个人的实在;社会现象可当作事物,强调其客观性;社会现象有两大特性即外在性和强制性。

中的劳动模范。如狼牙山五壮士、战斗英雄董存瑞、劳动模范英雄吴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等,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树立的典型。二是改革开放前树立的典型,其中,既包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工作的劳动模范、身先士卒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自力更生的先进集体等典型。例如,有工业上的王进喜、大庆油田,农业上的陈永贵、大寨大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典型。这些典型曾一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焦点与重心,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三是改革开放时期树立的典型,包括勇于探索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公安干警、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等,如小岗村、华西村、济南交警等集体典型和张海迪、徐洪刚、李素丽、徐虎、孔繁森、李向群、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许振超、方永刚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中国社会树立的典型大都是先进人物,即使树立“超级名村”典型(如大寨、华西村、南街村等),实质上也是突出坚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如陈永贵、吴仁宝、王宏斌等)。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典型符号是社会价值观的载体,构筑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长城”。在革命和建设树立典型的工作方法对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典型”带动了中国的历史。

②树典型活动已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思维模式,因而在各个时期无论什么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开展树典型活动,各种典型也应运而生。树典型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手段,典型是党的政策的活的解释者,不同典型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如革命战争年代要求人们奋勇杀敌、为夺取革命胜利贡献一切,于是就有了战斗英雄,有了支前模范;和平建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人们勤奋工作、积极生产,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于是有了劳动模范、致富典型、技术尖子、学习标兵、领导楷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于是有了优秀警察、共和国卫士、海空卫士等典型。

③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树典型”与“学典型”的语境。典型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形象解释,在树典型活动中,形成了“树典型”与“学典型”的语境。一个典型树立起来之后,权威机构马上号召全党甚至全国人民学习,要

求人人以学典型做典型为荣,在看典型、学典型、比学赶超的过程中,推进各项工作。在社会生活管理中,也有不少谚语反映了禁忌空喊、树立工作典范的重要性。如谚语云:喊破嗓子,不如拿出样子;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摆个样板看;一炮打响,万炮齐鸣;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一花引来百花齐放;一人仗义,众人相从;一人吃斋,十人念佛;一羊领头,千羊后继;村中有个好嫂嫂,满巷姑娘齐学好;一个出样,众人效仿;一人先进大家学,一人后进大家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① 这些谚语反映了树典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社会的普遍运用。

第二,作为社会现象或事实,树典型活动的作用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反思。^①在战争时代,在建立、巩固和建设政权时期,在中央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下,树典型活动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战斗英雄典型的树立,对于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雷锋、王进喜、大寨等典型的树立,对于倡导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②随着社会转型,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计划经济体制也正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价值观多元化与典型异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有些树典型活动的社会效果在弱化。这一现象非常值得重视。^③各个时期树典型活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拔高典型”、“假典型”^②、“典型蜕变”^③等。如受地方保

① 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36页。

② 假典型指虚假典型,即虚构事实塑造的典型,或把反面行为作为正面行为而推出的典型,例如“文革”期间推出的部分典型。

③ 典型蜕变即典型变质,指正面典型先进性衰退,甚至蜕变成反面典型的现象。